

第 1 章

金钱的智慧

犹太人认为“钱是赚来的”，中国人认为“钱是攒来的”，一个字的区别，体现了两个民族完全不同的金钱观。犹太人爱钱，他们从出生开始就被灌输“金钱是上帝的礼物”，中国人主张“士有百行，以德为首”认为“君子固穷”只会赚钱的人为世人所不齿。在新世纪的今天，发展才是硬道理，犹太人的金钱智慧应该得到借鉴和发扬。

1. 要成功就必须发达，赚钱才是真本事

智慧是民族间共有的财富，没有哪一个民族强大到不需要智慧的力量。关于金钱的智慧，每个民族的定义也不尽相同。犹太人以重视金钱闻名，他们认为金钱是散发温暖的圣经，是美好人生的祝福，是人给上帝的礼物。《塔木德》里说：赞美富户的人并不是赞美人，是赞美钱。在犹太人看来，金钱是人生存的工具，应该拥有。他们把钱和上帝联系到了一起，没有钱竟然连上帝的礼物都没有。金钱是成功的标志，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。这种独特的金钱观与我们传承了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似乎有些相悖，早在几千年前，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提出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的观点，意思是与君子谈事情，他们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；跟小人谈事情，他只是想到有没有利可图。在儒家看来，惟利是图是小人行径，真正的君子是能够安守贫困的，于是又有了“安贫乐道，君子固穷”一说。在浩浩荡荡的华夏文明中，首先被世人推崇的是道德，金钱一直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。他们倡导：“小人之交甘如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”、“粪土万户侯”、“朋友值千金，钱财如粪土”，认为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得到世人的尊敬与喜爱，而那些一味追求个人利益与财富的人应该受到鄙夷。

为什么二者在金钱的认识上有着如此大的不同呢？

犹太人在历史上，数次惨遭灭国之祸，他们被迫流亡到世界各国。但是无论到了哪个国家，哪个国家的人就歧视他们。犹太人要想在当地生存就必须缴纳各种高额的税金和说不清楚的捐

税，甚至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制于他们所纳的捐税。信奉同一宗教的人一起祈祷要纳税，结婚要纳税，生孩子要纳税，连给死者举行葬礼也要纳税，他们稍有疑义，别人就说他们是吝啬鬼，假如他们少缴了什么税金，立即就会遭到驱逐和屠杀。

他们时刻生活在动荡中，各种灾难和迫害随时会降临，而只有金钱可以给他们提供一点保护，让他们感觉到安全。当他们哪天遭到各地统治者驱逐的时候，金钱就可以换取别人的收留和保护；当地的人发起反犹暴乱的时候，他们可以用金钱去贿赂当地人的首领而求得一条生路；他们外出做生意的时候遭到土匪的抢劫，钱可以赎回他们的生命。钱是他们须臾不可少的东西，金钱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他们看得见的、摸得着的、实实在在的“上帝”是可以永远保护自己、让自己平安的“上帝”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获取钱财成了犹太人一种反射式的行动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发财，让自己变得有钱。他们对钱的崇拜也就达到了极端的地步。对于犹太人来说，钱居于中心地位。

在二战后驻日本的联合国军某司令部里，犹太士兵总是无端受到多方的歧视，根本没有尊严可言。犹太士兵只要走过，白人士兵势必要满怀憎恨和轻蔑地骂一声，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地议论挖苦犹太士兵一番，而犹太士兵虽然恼火也无可奈何。

有个叫威尔逊的犹太人，由于他的军衔很低微，更是受尽了白人士兵和高级军官们的歧视，大家都看不起他，背地里经常议论他，他也饱尝了人们对他的各种侮辱。但是他拥有犹太人智慧的头脑。一开始他口袋里也没有钱，他就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笔小钱，然后把这笔钱贷出去。在白人士兵里花钱大手大脚的现象很普遍，他们总是等不到发薪水的时候，就囊中羞涩了，他们看到威尔逊有钱，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借。

威尔逊就借钱给他们，同时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还清，且附带很高的利息，但是那些士兵早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威尔逊收到这些利息之后总是继续攒起来再借给那些士兵。对于还不起钱的人，威尔逊就让他们把自己一些值钱的东西做抵押，然后他再高价卖出。这样，过了没多久，威尔逊就过上了富裕的生活，他还买了 2 部车

和别墅，成了士兵里面的“大款”。这些待遇即使是高级军官也未必享受得到。从此以后，那些经常过山穷水尽、灰头土脸日子的白人士兵，对威尔逊趾高气扬的样子再也没有了，他们对威尔逊惊羨不已。

威尔逊用富有为自己赢得了尊严。

而在中国，中国是道德大国，老百姓虽然可以不接受系统的道德教育，但多数人都推崇孔孟之道，按照古老的道德在行事。特别是在金钱与道德的抉择上，假如两者只能择其一，那么中国人一定会选择道德。犹太人则不同，金钱对他们来说如此重要，他们为了获得金钱甚至可以不择手段，只要不违法，什么道德、亲情、友谊都可以成为交换金钱的筹码，这也是犹太人在世界上口碑不好的原因之一。道德永远是中国人的最高追求。中国古语说：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也是教育人们要淡泊名利，修身养性。

子曰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意思是：君子谋求治国之道而不谋求食物。耕田，有时还会挨饿；学道，却能拿俸禄。君子只担心没学好道，不担心贫穷。

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谋道不谋食的君子，古今文人更是以两袖清风来彰显自身的高洁。

春秋时期，宋国有有人得了块宝玉去送给大夫子罕，子罕不接受。献玉者说：“我请玉工看过，说是真正的宝玉，所以我才敢拿来献给您。”子罕回答说：“我以不贪为宝，你以宝石为宝，假如你把玉石给我，我们两个人就都失去了宝，所以不如我们各人保存自己的珍宝。”

可见在子罕心目中，品德更胜于金钱。

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里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：

管宁和华歆在年轻的时候，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。他俩成天形影不离，同桌吃饭、同榻读书、同床睡觉，相处得很和谐。

有一次，他俩一块儿去劳动，在菜地里锄草。两个人努力干着活，顾不得停下来休息，一会儿就锄好了一大片。

突然，管宁抬起锄头，一锄下去，“铛”一下，碰到了一个硬东

西。管宁好生奇怪，将锄到的一大片泥土翻了过来。黑黝黝的泥土中，有一个黄澄澄的东西闪闪发光。管宁定睛一看，是块黄金，他就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当什么硬东西呢 原来是锭金子。”接着 他不再理会了，继续锄他的草。

“什么 金子！”不远处的华歆听到这句话 不由得心里一动 赶紧丢下锄头跑了过来，拾起金块捧在手里仔细端详。

管宁见状，一边挥舞着手里的锄头干活，一边责备华歆说：“钱财应该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去获得，一个有道德的人不可以贪图不劳而获的财物。”

华歆听了 嘴上说：“这个道理我也懂。”手里却还捧着金子左看看，右看看，怎么也舍不得放下。后来，他实在被管宁的目光盯得受不了了，才不情愿地丢下金子回去干活。可是他心里还在惦记金子，干活没有先前努力，还不住地唉声叹气。管宁见他这个样子，不再说什么，只是暗暗地摇头。

又有一次，他们两人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。正看得入神，忽然外面沸腾起来，一片鼓乐之声，中间夹杂着鸣锣开道的吆喝声和人们看热闹吵吵嚷嚷的声音。于是管宁和华歆就起身走到窗前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原来是一位达官显贵乘车从这里经过。一大队随从佩带着武器、穿着统一的服装前呼后拥地保卫着车子，威风凛凛。再看那车饰更是豪华：车身雕刻着精巧美丽的图案，车上蒙着的车帘是用五彩绸缎制成的，四周装饰着金线，车顶还镶了一大块翡翠，显得富贵逼人。

管宁对于这些很不以为然，又回到原处捧起书专心致志地读起来，对外面的喧闹完全充耳不闻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

华歆却不是这样，他完全被这种张扬的声势和豪华的排场吸引住了。他嫌在屋里看不清楚，干脆连书也不读了，急急忙忙跑到街上跟着人群尾随车队细看。

管宁目睹了华歆的所作所为，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叹惋和失望。等华歆回来以后，管宁就拿出刀子当着华歆的面把席子从中间割成两半，痛心地宣布：“我们两人的志向和情趣太不一样了，从今

以后，我们就像这被割开的草席一样，再也不是朋友了。”

管宁因华歆过分重视钱财和名利的品格而与之断交，这样的做法在犹太人看来似乎不可理喻，在中国却受到了世人的推崇。

那么，在当今社会，究竟哪一种金钱观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规律，让自己从中受益呢？

在今天的社会，获取经济成功已经成为一条生存的基本法则，要成功就必须发达。人的成功标志和价值，更多的是依靠财富的多寡来衡量。任何一个不甘于平凡的人都在努力赚钱，尽管是出于自己生活的需要，但是对富有追求的人们来说，金钱更是人们社会地位的象征，是人们心灵宁静的重要保证。

著名的作家索尔·贝娄说：“金钱是惟一的阳光，它照到哪里，哪里就发亮。”钱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尺度，一种不以其他尺度为基准，相反可以凌驾于其他尺度之上的尺度。

在现代社会，社会成员都倾向于追逐名利，名利就是资本，资本就是金钱，金钱能换来地位，金钱与地位能带来幸福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是全人类共同的感受。面对全人类共同的感受，我们怎么办？是压制它、控制它，还是弘扬它？这就是我们的道德抉择，什么都要讲度，金钱再好，不能拜金主义，名利再好，不能名利至上，所有这些主义和至上，都是把痛苦留给别人，自己只要快乐，带来的是消极的社会影响，一个人的金钱、名利和地位应该是自己能力、修养、素质的体现，而不是争风吃醋的结果。所以，对于金钱，我们要“逐”而不“夺”，“逐”即是犹太人的“金钱至上”，“不夺”即为中国人的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两者结合，方为正确的金钱价值观，也是中华智慧与犹太智慧相互渗透的结果。

2. 金钱是一面镜子

有人说，金钱是一面魔镜，人一旦被它照上，就很难抵挡住它的诱惑。金钱的作用的确非同一般。晋惠帝时的鲁褒在其传世之作《钱神论》中曾愤世嫉俗地描绘了钱在当时的作用：“钱之所在，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。危者得安，死者得生。”所以千百年来人们诅咒金钱，甚至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。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在《雅典的泰门》中借用泰门之口对金钱的控诉更是淋漓尽致，入木三分：“金子 黄黄的、发光的、宝贵的金子！……这东西 只这一点点儿，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，丑的变成美的，错的变成对的，卑贱变成尊贵，老人变成少年，懦夫变成勇士……”金钱的作用竟然变得如此不堪入目！

金钱的产生原本是社会进步的产物。商品交换出现后，货币（金钱），用来充当一切商品等价物的特殊商品。金钱没有变，变的是被金钱晃了眼、迷了心的人。金钱不是恶魔，真正的恶魔是被金钱的作用诱惑得丧失了理性和道德的人。金钱没有错，错在人们对金钱的态度上。

金钱的确是一面镜子，但它不是魔镜，因为它原原本本地照出了人的本性。品德高尚的人，在它面前依然魅力无穷。

杨震是东汉时期一位著名文士，他为官清廉，从不接受别人的贿赂，所以人们称颂他是一位难得的清官。

相传杨震在任东莱太守的途中路过昌邑，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的下属，他想这可是个巴结杨震的好机会，于是在当天晚上带了

黄金 10 斤，悄悄地去拜访杨震，杨震拒不接受。王密以为杨震是假装推辞，就说他到这儿来没有人知道。杨震义正词严地说，天知，地知，我知，你知，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？王密听后，十分惭愧，只好把礼物带走。

对待金钱的态度，充分展示着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。坚信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”的人，必将沦为金钱的奴隶；信奉“金钱万能”，想方设法、不择手段去获取金钱的人，则极有可能“丧身于钱财之中”。豁达的人说：“钱这东西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够用就行。”明理的人说：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”洁身自好的人，在金钱的面前依然是光彩照人。

所罗门时期的某个安息日，有三个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，他们身上带着很多现金，出行非常不方便。于是大家将钱埋在一个秘密的地方，并约定好明天一起来取。其中有个人中途偷偷地溜回来，取走了所有钱财。

第二天，大家发现钱被偷了，便想一定是自己人所为。可到底是谁偷的呢？三个犹太人百思不得其解，就一起来到了素以断案英明著称的所罗门那里求助。

所罗门弄清事情的梗概后说：“我也有道难题解不开，请你们三位帮忙解决一下，我再为你们裁决。”

所罗门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有个姑娘答应嫁给某男，并订了婚约。但不久以后，她爱上了另外一名男子。于是，她要求跟未婚夫解除婚约，并表示愿意付给未婚夫一笔赔偿金。未婚夫听了，很痛快地跟她解除了婚约，却没有接受她的赔偿金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姑娘被一个老头拐骗了。姑娘对老头说：“我的未婚夫不要我的赔偿金就和我解除了婚约，所以，你也应该如此待我。”那个老头也同样答应了她的要求。

故事讲完了，所罗门问那三个犹太人：“姑娘、青年和老头，谁的行为最值得赞扬？”

犹太人甲说：“男青年不强人所难，又不要赔偿金，其行为最可嘉。”

犹太人乙说：“姑娘有勇气和未婚夫解除婚约，大胆追求爱情”

并坚持和最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其行为最可嘉。”

犹太人丙说：“这个故事简直莫名其妙，那个老头拐骗姑娘就是为了钱财，可为什么不要钱就放姑娘走了呢？”

犹太人丙话还没说完，所罗门就指着他大喝一声：“你就是那个偷钱财的人！”

然后，所罗门解释道：“甲和乙关心的是故事中人物的爱情和个性，而丙只想到金钱，所以他肯定是小偷无疑。”

金钱是窥视人格的一面镜子，从中既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卑微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高尚。品行卑劣的人心中只有金钱而没有道义，品行高尚的人往往由于注重道义而忽视金钱。

陶渊明是东晋后期的大诗人，也是名人之后（他的曾祖父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）。但陶渊明生性淡泊，在家境破落，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沉醉于读书作诗。为了生存，陶渊明做过州里的小官，可他看不惯官场上那一套恶劣的作风，不久便辞职回家了。后来，他还陆续做过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职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。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，是义熙元年（405年）那一年，已过“不惑之年”（四十一岁）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，再次出任彭泽县令。有一次，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。有人告诉陶渊明：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，应当穿戴整齐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。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，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。”说完，他就辞掉官职，回家去了。陶渊明当彭泽县令，不过80多天。他这次弃职而去，便永远脱离了官场。此后，他一面读书为文，一面参加农业劳动。后来他的农田不断受灾，房屋又被火烧，家境变得越来越差。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，甚至连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也坚拒不受。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，也被他拒绝了。

陶渊明是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的。他原本可以活得舒适些，至少衣食不愁，但那要以人格和气节为代价，于是他选择了缺衣少食的贫困生活。有得必有失。陶渊明获得了心灵的自由，获得了人格的尊严，写出了流传百世的诗文。他在给后人留下宝贵文学财富的同时，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。他那不为“五斗米折腰”的高风亮节，成为中国后代文人乃至所有中国人的楷模。

周朝时，齐国有一年发生大饥荒。有个叫黔敖的财主准备了一些食物放在路边，等待受灾的难民来吃。不一会儿，就有一个饥民走过来了。黔敖冲着他喊：“嗟！来食！”那饥民睁大了眼瞪着黔敖说：“我就是因为不吃这种‘嗟来之食’（轻蔑地吆喝着施舍的食物）才饿成今天这副样子的！”黔敖当即道歉，但那饥民坚决不吃，最后饿死在路边！

这是《礼记·檀弓下》中记载的小故事——《嗟来之食》故事中的饥民宁愿饿死也不接受黔敖带侮辱性的施舍，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。

金钱是一面镜子，犹太文明和中华文明这种双赢的智慧告诉我们：对金钱的态度可以衡量出一个人人格的高低，金钱是人们交换物品的载体，人品好的人会让金钱带给他快乐和精神财富；人品不好的人，会成为金钱的奴隶，以为有了很多金钱就能目空一切。所以，一个人的人格和金钱一样。在人格好的人手上，钱会很珍贵，在邪恶的人手上，会令人发指。金钱是把双刃剑，聪明人用它享受人生，糊涂人被它腐蚀。

3. 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

犹太人爱钱，他们说：“钱不是罪恶，也不是诅咒，钱会祝福人。”

犹太人中流传着一则笑话，表明他们对金钱的态度：

巴拉文一家都接受了洗礼，可萨洛蒙仍想同他结为儿女亲家，巴拉文十分不高兴，他对萨洛蒙说：“老弟，我们可不能结为亲家呀，第一，你是犹太教徒，我是基督教徒；第二，你穷得和叫花子差不多，一个钱都没有，你知道，对我们犹太人来说，金钱可比一切都重要。”

这则笑话，表面上在调侃巴拉文坦前言不搭后语，刚谈自己是基督教徒，接着又自称是犹太人。但仔细琢磨却是：巴拉文在基督教的压力下，不得不改宗，但永远改不掉对钱的态度。因为他血管里流淌的是犹太人的血，而犹太人则从骨子里就崇拜金钱。

清人袁枚有首《咏钱诗》：

人生薪水寻常事，动辄烦君我亦愁。解用何尝非俊物，不谈未必定清流……

“财是养命之源”从古至今，不管哪一个民族，钱对人民都是十分重要的，谁也离不开它。从命理的角度来说，追求钱财也非常正确。凡是人都有追求，对金钱的追求，对名利的追逐，对财富的渴望，这些都无可厚非。但追逐也好，追求也罢，都要有度。这就是老子所说的，不能无限度地求满求盈。在老子看来，满而溢，刚而折，骄而败，富而咎，这是天道。所以，老子告诫人们不可贪得无厌，不

知满足。事能知足心常泰，人到无求品自高。

而犹太人不同，他们认为，只要不违法，靠自己经营能力赚钱就受之无愧。

在 19 世纪初，德国人梅特里兄弟移居美国，定居密沙比，他们无意中发现密沙比是一片含铁丰富的矿区。于是，他们用积攒起来的钱，秘密地大量购进土地，并成立了铁矿公司。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后来也知道了，但由于晚到了一步，只好在一旁垂涎三尺，等待时机。

1837 年，机会终于来了。由于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，市面银根告紧，梅特里兄弟陷入了困境。

一天，矿上来了一位令人尊敬的本地律师，梅特里兄弟赶紧把他迎进家中，待作上宾。

聊天中，梅特里兄弟的话题不免从国家的经济危机谈到了自己的困境，牧师听到这里，赶紧接过话题，热情地说：

“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啊！”

走投无路的梅特里兄弟大喜过望，忙问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牧师说：“我的一位朋友是个大财主，看在我的情面上，他肯定会答应借给你们一笔款子。你们需要多少？”

“有 42 万就行。可是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”

“放心吧，一切由我来办。”

梅特里兄弟问：“利息多少？”他们想，借贷利息一定很高。

谁知牧师说：“我怎么能要你们的利息呢？”

“不，利息还是要的，你能帮我们借到钱，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，哪能不付利息呢？”

“那好吧，就算低息，比银行的利率低 2 厘，怎么样？”

两兄弟以为在做梦，一时呆住了。

于是，牧师让他们拿出笔墨，立了一个借据：

“今有梅特里兄弟借到考尔贷款 42 万元整，利息 3 厘，空口无凭，特立此据为证。”

梅特里兄弟又把字据念了一遍，觉得一切无误，就高高兴兴地在字据上签了名。

事过半年，牧师再次来到了梅特里兄弟的家里，他对梅特里兄弟说：“我的那个朋友是洛克菲勒，今天早上他来了一封电报，要求马上索回那笔借款。”

梅特里兄弟早已把钱用在了矿上，一时间毫无还债的能力，于是被洛克菲勒无可奈何地送上了法庭。

在法庭上 洛克菲勒的律师说：“借据上写得非常清楚 被告借的是考尔贷款。在这里说明一下考尔贷款的性质，考尔贷款是一种贷款人随时可以索回的贷款，所以它的利息低于一般贷款利息。按照美国的法律，对这种贷款，一旦贷款人要求还款，借款人要么立即还款，要么宣布破产，二者必居其一。”

于是，梅特里兄弟只好选择宣布破产，将矿产卖给洛克菲勒，作价 52 万元。

几年之后，美国经济复苏，钢铁业内部竞争也激烈起来，洛克菲勒以 1941 万元的价格把密沙比矿卖给了摩根，而摩根还觉得做了一笔便宜生意。

在这个例子中，有人会说洛克菲勒不守商业道德，但是洛克菲勒并不这样认为，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完全合法。况且商业经营的最高目的就是赚钱，其游戏规则是不受限制的。

相形之下 我们中国人的‘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’的儒家理财观念似乎更胜一筹。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，应该是每个求财人的正确理念。

1973 年，石油危机波及香港。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依赖进口。香港的进口商趁机垄断价格，将价格炒到厂家难以接受的高位。

年初，每磅塑胶原料卖 6 角 5 分港币，秋后竟涨到每磅 4 至 5 元港币。

这种情况让不少厂家被迫停产，濒临倒闭。可这场危机对李嘉诚的影响却不大，因为此时他的经营重心已转移到地产上，况且他所经营的长江公司本身备有足够的原料库存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李嘉诚却毫不犹豫地挂帅救业。在他的倡议和牵头下，数百家塑胶厂家入股组建了联合塑胶原料公司。

原先单个塑胶厂家无法直接向国外进口塑胶原料，因为购货

量太小。现在由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出面，购货量比进口商还大，因此可以直接交易。

所进口的原料，按实价（其实并不高，只是被进口商炒高了）分配给股东厂家。在厂家的联盟面前，出口商的垄断不攻自破。

笼罩全港塑胶业两年之久的原料危机，一下子烟消云散。

李嘉诚在救业大行动中，将长江公司的 12.43 万磅原料以低于市价一半的价格救援停工待料的会员厂家。直接购入国外出口商的原料后，他又把长江本身的配额——20 万磅原料，以原价转让给需求量大的厂家。

危难之中，得到李嘉诚帮助的厂家达几百家之多。

李嘉诚因此被称为香港塑胶业的“救世主”。

李嘉诚这种有钱不赚的做法，与儒家的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的思想不谋而合。佛家有云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”，李嘉诚救人于危难的义举，为他树立了崇高的商业形象，他的信誉和声望义薄云天。信誉和声望无疑又会回馈他无尽的生意和财富。

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的“道”。“道”指的是什么呢？首先，“道”指的是诚信，这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，没有诚信，固然能小骗得手，却失去了长久发展的机会。其次，“道”指的是要学会散财。财富取之于社会，更应力所能及地回报社会，这是道义责任，也是最好的形象宣传方式。再次，“道”要求有一个稳定的心态。罗马非一天建成，急功近利是致富路上的大敌。这是中国儒家的理财思想，这样的经商理财风范，犹如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这样的经商理财行家也被称为“儒商”。

“为商之道”即“为人之道”，经商理财，首先讲的就是心态。儒家讲究“见义勇为”，儒商讲究“见利思义”，儒家讲究“和为贵”，儒商讲究“和气生财”。这里的“和”不仅仅讲的是对顾客的态度，也讲的是对商道中人、同行同业的态度。“顾客是上帝”的观念早在儒商中扎根，尽管“同行是冤家”，要讲竞争，但儒商的风度、大家的风范是“君子不同而和”。这是一种境界，一种秩序，一种平衡，一种和谐。

中国的一句老话：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，说的也是此理。“酒香”

讲究的是质量，以质量取胜的理念是“取之有道”的根本，即使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都占有了，却不讲究质量，结果仍等于零。这样的经商理财者缺乏大家风范，王者之气。“风物长宜放眼量”，小家子气，短视者是干不了大事的。

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也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化气息，要有一种超然物外的眼光去“取”。掉在铜钱眼里就只是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所以往往导致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，只有将“取之有道”哲理化，才能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才能清晰地看透“取之有道”的规律和本质。

以此儒学思想来经商理财自然技高一筹，胜多失少。

4. 朋友和金钱要分开

莎士比亚有句名言：“不要把钱借给别人，借出去会使你人财两空；也不要向别人借钱，借进来会使你忘了勤俭。”你可以用友善的方式接济你的朋友，但不要借钱给他，借钱给他人就是掏钱为自己买了一个敌人。

犹太朋友之间很少涉及金钱，他们之间朋友是朋友，金钱是金钱，分得十分清楚，一般他们不会把金钱掺入友谊，也不愿意借钱给别人。而中国人之间讲究的是“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”的侠义精神，只要“一方有难”立即会得到“八方支援”，这里的支援不仅是精神上的，还有物质上的。如此看来，犹太人的金钱友谊观更能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，从长远看，也更有利于友情的长久维持。

朋友之情是个软绵绵的玩意儿，有弹性，有回旋之力。对朋友不能毫无保留的全部相信，也不能全部否定。正确地掌握好与朋友之间的尺度，理性的看待这个世界，绝不要盲目，这才是正确的金钱友谊观。

有个故事是这样说：

雅克夫借给亚瑟 500 美元，明天就要到期了，但是亚瑟根本就没有钱可以还。雅克夫在三天前就提醒亚瑟，还有三天就该还钱了。

“到明天雅克夫一定会来要钱的”，想到这里，亚瑟坐立不安，烦躁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

“你为什么还不睡觉？”他的妻子问他。